

其他共和国，其他模式：伯尔尼、巴塞尔、圣加仑与日内瓦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苏黎世既不是欧洲资本市场上第一个瑞士投资者，也不是最大的瑞士投资者。这一地位属于伯尔尼。伯尔尼共和国自十七世纪末起开始以专业方式管理其财政盈余。自 1710 年起，它委托 Malacrida & Cie. 银行与伦敦的 Samuel Müller & Cie. 共同在海外投资公共资金。Nikolaus Malacrida 原为钟表匠，后转而从事银行业和造纸业，1702 年在数位贵族的支持下创办了自己的银行。该行在整个欧洲享有极高的信誉，但在 1720 年法国约翰·劳（John Law）体系失败后倒闭，给伯尔尼的家族造成重大损失。他的女婿 David Gruner 于 1722 年与伯尔尼政府谈判达成和解，并接手了该业务。¹ 这场危机的损失总额估计为 44 万塔勒，分摊于约五百名债权人，从国家和乡村社区到行会、家族信托和个人。由于缺乏任何跨境破产程序，清算拖延了约十一年。²

伯尔尼模式在一个关键方面不同于苏黎世模式。伯尔尼通过受托行事的私人银行家自行投资国库，而苏黎世则在一代人之后设立了一个汇集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的公共中介机构。伯尔尼 1720 年的经历很可能影响了苏黎世的设计：Malacrida 的倒闭显示了将公共资金托付给一家国家无法控制其其他业务的私人银行的危险。1755 年的委员会由议员组成，其资产在市政厅内以三钥匙制度保

其他共和国，其他模式：伯尔尼、巴塞尔、圣加仑与日内瓦

管，可以被解读为对这一危险的回应，尽管本章所参考的文献并未记载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

伯尔尼投资的规模远远超过苏黎世的任何尝试。1798 年被没收时，伯尔尼国库价值约 2160 万图尔里弗尔，其中约 1060 万为金银，约 1100 万为证券。相比之下，苏黎世的国库仅有 62.2 万里弗尔。1719 年，伯尔尼一度是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的最大股东，并在泡沫破裂之前售出了股份。它还持有神圣罗马帝国的债券。国库使伯尔尼得以免征直接税，并支持向本国公民和企业家提供贷款。³Christoph Schaltegger 及其合著者 Thomas Studer、Laura Zell 和 Michele Salvi 于 2020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计，如果 1798 年之后国库仍按照伯尔尼各议会此前的方式管理，该州本可在 115 年内免征税收。⁴这一计算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但它生动地说明了伯尔尼所取得的地位——用一篇报道的话说，伯尔尼一度是伦敦金融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⁵

其他瑞士共和国则尝试设立更面向国内的公共信贷机构。Martin Körner 指出，较早的国家银行与巴塞尔的 *城市兑换所*（Stadtwechsel）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后者于 1744–1746 年被清算——并失去了重要性，但在该世纪中叶出现了新的机构：1752 年圣加仑开设了 *官方亚麻布资金库*（Obrigkeithliche Leinwatcassa），为亚麻布制造商提供信贷；1755 年苏黎世创办了 Leu。⁶圣加仑的 *亚麻布资金库* 与苏黎世的 *利息委员会*（Zinskommission）因此在三年之内相继出现。它们代表了对原始工业化经济中同一资本问题的两种回答。圣加仑利用公共资金在本地为其主要出口产业融资，而苏黎世则利用公共资金向海外输出资本，将国内信贷留给商人。苏黎世的选择反映了第 C.I 章所讨论的私人商人银行家和 *包买商*（Verleger）的实力，他们以自有资源为丝绸和棉花贸易融资，不希望在自己的市场上出现一个公共竞争者。

日内瓦是本书姊妹卷的主题，它走了第三条道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私人行为者。该城的资本由私人银行家族动员，其中包括 d'Aubert、Boissier、Fatio、Lullin、Mallet、Rigot、Rilliet、De la Rue、Sellon 和 Thellusson 等家族，其中一些家族到 1700 年前后已专门从事银行业，在欧洲各大城市维持着家族、友谊和业务关系，并能够接触各国政府。⁷十八世纪末日内瓦最著名的技术，是将法国终身年金汇集在三十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年轻女孩的生命之上，即“日内瓦三十少女”（*trente demoiselles*）或“日内瓦三十不朽者”（*trente immortelles de Genève*）。银行家们挑选出身良好家庭、年龄在四至七岁之间的儿童，她们的预期寿命预示着长期的支付流；银行家将年金组合成大额区块，并向客户出售份额，通常通过所谓的连带票据（*billets solidaires*）分期付款。主要的投机浪潮发生在 1771 年、1778–1779 年和 1782–1783 年。到 1793 年，已累积约 1030 万里弗尔的年金。⁸

这一比较有助于理解苏黎世模式。日内瓦的银行家在法国公共债务中持有大规模、集中且带杠杆的头寸。当革命政府以不利条件整合其年金、指券（*assignats*）崩溃时，其中许多银行家破产，Lullin、Passavant 和 Bontems 等银行均在其列。⁹伯尔尼持有巨额国库，通过私人代理人管理，其中大部分却被外国军队夺走。苏黎世处于这两极之间。其公共委员会比日内瓦的银行规模更小、更分散，也更保守。其投资组合是代表存款人持有的，存款人的债权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与国家的债权区分开来。适中的规模、分散化和独立的法律身份这一组合，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 Leu 在革命中幸存下来，而许多日内瓦银行和伯尔尼国库却未能幸免。

1 注释

1. 《瑞士历史辞典》（HLS），“Malacrida, Nikolaus”，2008 年 8 月 14 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42062/2008-08-14/>。

其他共和国, 其他模式: 伯尔尼、巴塞尔、圣加仑与日内瓦

2. Wikipedia , “ Bern banking crisis of 1720”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n_banking_crisis_of_1720 (仅作参考查阅) , 关于 1710 年的委托、与 Samuel Müller & Cie.的合作关系、估计损失以及清算的持续时间。
3. 关于 Christoph A. Schaltegger 及其合著者的研究 Napoleons reiche Beute 的文章 (Brunne Zytig) , PDF 由卢塞恩大学托管 , <https://www.unilu.ch/fileadmin/fakultaeten/wf/Dekanat/Bilder/Professuren/Schaltegger/Artikel-BrunneZytig.pdf>。
4. 卢塞恩大学, “Napoleons reiche Beute”, 2020 年 7 月 20 日新闻稿, <https://www.unilu.ch/news/napoleons-reiche-beute-5275/>; 该书由伯尔尼的 Stämpfli Verlag 出版。
5. SRF News, “Bern wäre reich – hätte Napoleon den Staatsschatz nicht erbeutet”, 前引。
6. HLS, Körner, “Banken”, 前引。
7. HLS, Körner, “Banken”, 前引。
8. Marc Cramer, “Les trente Demoiselles de Genève et les billets solidaires”, 瑞士经济与统计学会期刊, 1946 年第 II 期, 此处见第 113 页 (在线档案) , <https://www.sses.swiss/journal/archive/pdf/1946-II-2.pdf/> ; 另见 Daniela Solfaroli Camillocci, “Trente immortelles de Genève” , 100 Elles , <https://100elles.ch/biographies/trente-immortelles-de-geneve/>。
9. Cramer, “Les trente Demoiselles de Genève”, 前引, 第 129–131 页。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 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 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other-republics-other-models-bern-basel-st-gallen-and-geneva

Copyright © 2026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 瑞士律师、香港事务律师、英格兰及威尔士事务律师。如需了解更多有关瑞士法律、税务及信托服务的信息, 请访问 www.ressos.ch